

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货币思想史巨著

——评《中国货币思想史》

陈晓东

中国是有悠久的货币经济和货币思想的文明大国。研究中国货币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货币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性,总结中国货币思想发展的经验教训,不仅会为我国当前的货币金融理论探索和货币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能够促进我国货币思想的交流,丰富世界货币思想文化的内容。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家骥教授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2001 年出版)应时而生。《中国货币思想史》在借鉴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本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它以开阔的视野、新颖的思维、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述,将长达 3000 年的纷繁复杂的中国货币思想史发展历程清楚地展现于世,大大深化了中国货币思想史的研究。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史与论的紧密结合。论由史出,史论结合,是该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该书从严格的历史主义出发,以历史年代为纲,以人物为考察对象,所有的论述都以详实的材料作为依据。所论各时期的货币思想,既包括了有关货币思想代表人物的具体言论、文献,而且收集了各代表人物的生平、思想渊源及其所处社会背景,内容详实,叙述深入浅出,这些经过精心梳理而成的货币思想史料,不仅因为传达了丰富的货币思想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其是以各思想家货币思想的演变过程为参照而发掘的,故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该书史论结合,不仅表现在对货币思想史料的充分占有上,还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上。该书仅列入章节中作专题论述的人物就达 145 人之多,全书注释 2000 条以上,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原著引文 300 条以上,涉及历代著作、论文几百部(篇)以上,论述的历史人物中有许多是其他学术著作所未曾提及或虽有涉及但语焉不详的。这一点该书的古代部分更为突出,如唐代第五琦、刘晏、张九龄、杜佑,宋代赵开、王之望、宋孝宗、王安石、欧阳修、杨冠卿、卫泾、陈耆卿、林珣、戴植,元代王文统、马亨、卢世荣、王辉、刘宣、张之翰、叶李、赵孟頫、程钜夫、马端临、高则诚,明代陈瑛、夏原吉、黄福、范济、萧端蒙、何良俊、郭子章、赵四卿、高拱、杨继盛、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张溥、王象乾、陈子龙、钱秉镫以及金代和清代前期等,均是以往货币思想史少有提及或没有提及的。

该书几乎每章都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用以说明各时期各主要代表人物的货币思想,该书许多重要观点、结

论都是从丰富的史料中发掘出来的,是论从史出的结果。因此,该书从总体上说,较好地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

2. 构筑了完备的货币思想理论体系,在结构安排上具有合理性。该书遵循历史与逻辑思想统一的原则,以历史年代为线索,以各时期的历史人物著作和历史文献为依据,构建了全新的、比较完整的货币思想史体系,历史地、详细地展开论述了中国货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渊源,提示了货币思想的产生、发展、完整体系的建立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发展。

《中国货币思想史》共 127 万字,分为三卷,即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相应地,中国近 3000 年货币思想史被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阶段,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古代卷研究的起始时间是从先秦至 1840 年,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先秦到唐代,下编从宋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共 19 章。近代卷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编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从 20 章至 28 章。现代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 1978 年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货币思想,下编着重论述从改革开放至今理论界对货币理论的新探索。

该书体系结构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它对中国现代货币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迄今为止第一次将古代、近代、现代货币思想集中论述,构筑了中国货币思想史的完整体系,在结构安排上具有合理性,这种科学的、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分期方法本身在中国货币思想史研究上就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填补了中国货币思想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3. 该书关于中国现代货币思想发展历程的全面、系统论述,既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般而言,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与学科宗旨相适应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货币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货币思想产生发展的规律。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探讨中国社会各历史阶段的货币思想发展历程,在这一方面,货币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以前的研究只是孤立地把古代、近代和现代货币思想分离开来进行研究,或者仅仅是对古代和近代的货币思想进行综合研究,而没有能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货币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该书克服了这一弊端,不仅吸收了以往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博采众家之长,而且对中国古代至近代的货币思想演变作了总体考察,详细研究了各时期关于实际货币问题的对策以及各时期货币思想中货币基础原理的探讨。以此为基础,在现代卷中,该书不仅探讨了 20 世纪 50 至

60年代中国货币理论工作者对一般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的研究,而且更多地涉及到改革开放后关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

这些研究,不仅对货币思想史理论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中国金融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之路,既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4. 该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它所揭示的近现代关于货币流通的普遍规律和实际经验教训给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以重要启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很快进入中国。1845年,英商丽如银行就在香港设立分行。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日、俄、法、美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银行。在1890-1902年的12年间,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会理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相继设立,加上原有已存在多年的英国汇丰银行,形成列强并存的局面。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即擅自发行货币。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货币,一方面侵占了中国的货币市场,另一方面阻碍了整理币制的实施。加之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对我国整理币制动议的直接干涉,几乎使得此项工作无法开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也要在5年之内分3个阶段对外开放,届时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激烈的挑战和冲击,如何应对这一局面,防止国际金融势力对中国金融业的操纵,牢牢把握金融控制权,提高银行自身的竞争力是一条途径,而政府得力的金融货币政策、有意识的防范也很重要。

5. 《中国货币思想史》一书凝结了四代学人心血,是集体团结、合作的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侯厚吉教授搜集了200万字的资料,为该书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91年,在生命垂危之际,侯老在自挽

联中留下了“回头应有感,遗篇犹待后归册”的遗嘱,并把全部资料、手稿交给了课题组。主编张家骥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撰写该书,主要负责设计全书体系框架,拟定卷、编、章、节大纲,提出各章节写作要求,并对初稿进行了审读和改定。作为第三代学者的万安培、邹进文博士,既有比较扎实的史学基础,又有较高的经济学素养,为完成该书写作付出了艰辛劳动。该书第四代学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把货币思想史作为主攻方向,他们思想活跃,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新观点。以往出版的有关著作,均为个人或基本上是个人的专著。个人的精力终归有限,该书是一个良好学术团体集体努力的成果,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发掘了大量前人所未曾利用的史料。如唐代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钱本草》;清代蔡之定的《为述古裕今敬陈管见》的行钞议论;民国时期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等。

总之,该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为基本工具,又吸取了当代国内外货币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始终着眼于中国货币理论积累和发展的过程,由此揭示其规律和特色;始终着眼于中国货币理论在世界货币理论中的地位,指明中国货币理论在世界货币理论发展史上长期领先和长期落后的原因;始终着眼于货币理论的发展渊源及货币理论的发展是围绕各个历史时期货币问题而展开的,明确提出各个历史时期货币理论研究和讨论的焦点、热点;始终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该书不仅是货币理论史的一大贡献,也必将对现实的货币理论研究、教学和货币工作起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430022)

(责任编辑: N)

(上接第126页)就是一个有益的成功尝试。但作者又强调指出,不可滥用数学,因为现在滥用数学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以致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对之“提出严重警告”。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该书围绕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如何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中心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作者坚决抵制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改革事业的侵蚀,准确地把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归结为:关于市场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制度、关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界有的人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吴易风教授旁征博引,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坚决驳斥了这种违反基本科学常识、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充分论证了我国当前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

制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个人、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反对私有化的主张,或在“非国有化”、“民营化”等各种名义下搞变相的私有化。

前车之鉴,后者之师。书中还收入了作者1995年访俄报告——《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和中国经济问题》,俄国学者在文中反思了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并提出了中国改革要以俄为鉴的观点,十分符合我国人民的心愿。因此该文在1995年公开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普遍赞扬。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作者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注释:

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91、181、18、321、322、362、435、254、44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6)

(责任编辑: N)